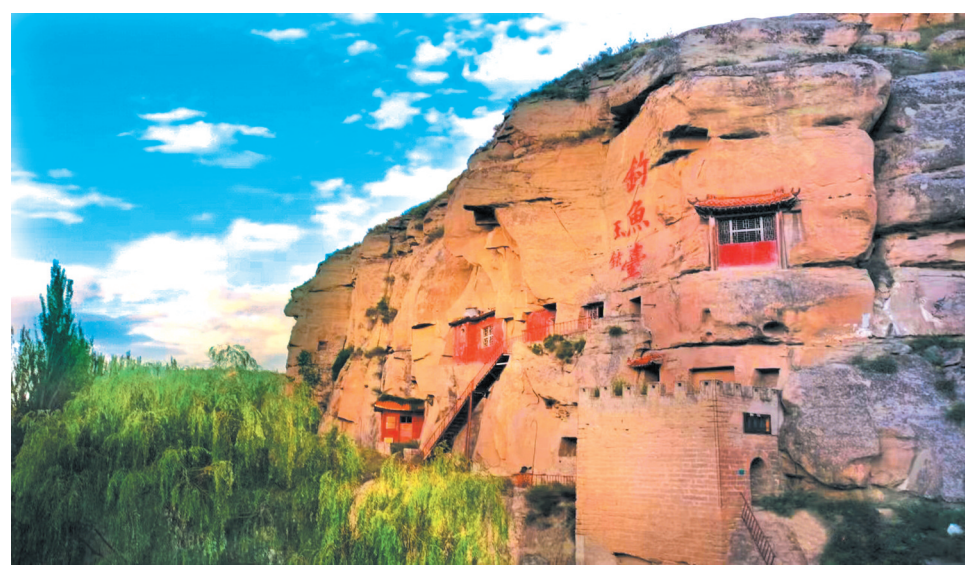


人物春秋

秦晋相望 史迹留声

——对明末保德人物陈奇瑜跌宕人生的审视

□冯云



钓鱼台

“黄河浩荡，看江山无限。岁月流淌，明辨忠与奸。前世风雨，后世尘烟，成败只在弹指一挥间……”春节假期，闲暇追看短剧《大明总督陈奇瑜》，该剧热度达2500多万，好评如潮。剧情終了，主题曲犹在耳边回旋不绝。这是一部由保德人韩补清投资拍摄、反映保德历史名人的作品，它让一段尘封的明末往事重新走进了今人视野。

心，亦难容于乡里情谊。他的剿抚思路有着浓厚的边地色彩——能抚不剿，能遣不杀，重在归农，安插原籍。然而明朝官场极重“同乡通贼”嫌疑，陈奇瑜作为保德人，面对的又是始发于陕北、蔓延秦晋的起义队伍，若稍露偏袒，必被扣上“乡党误国”的帽子。于是他的恻隐之心只能转化为“围而不歼”的招抚策略。

三

当王嘉胤的起义军在黄河两岸攻城略地时，保德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崇祯初年，王嘉胤攻陷河曲等地后，屡次进犯保德城。此时的保德并非安宁之地，危急存亡之际，另一位保德人站了出来——他就是王邵。

王邵，字二弥，天启年举人，崇祯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面对王嘉胤的接连进犯，这位文官没有退避，而是“寝食城头，运筹方略，为城守计”。他做了一件极具胆识的事：设计擒获王嘉胤之妻，将其囚于狱中。待贼兵再度来攻时，王邵下令将王嘉胤的妻子缚于长竿，悬于城墙外侧，示于贼众。王嘉胤部下虽怒不可遏，却见城防坚固，难以攻克，最终只得引兵退去，保德城也因此得以保全。王邵后来将此次守城经历与方略著述成书，留有《庚午守城纪略》《弭盗已试录》等著作。

同王邵同为保德人，王邵选择以铁腕捍卫城池百姓，而陈奇瑜在处置陕北起义队伍时，却多了几分不忍与宽纵。王邵守城时的决绝狠厉，是孤城无援之下的绝地自保之举，恰与陈奇瑜在车厘峡的招抚宽缓形成鲜明对照。二者差异不仅源于双方兵力态势与所处境遇的不同，亦是其个人情怀及治理理念使然。

四

事实上，车厘峡一役发生时，王嘉胤已败亡，被困车厘峡的是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部众多为延安、安塞、米脂一带人，并非早年府谷本地队伍。然而即便如此，陈奇瑜仍选择投降遣返、放归陕北。此举公开理由是“朝廷剿抚大计”，但其底层逻辑却有多重因素交织：一是地方大吏面对秦晋桑梓的恻隐之心，不忍尽加诛戮；二是彼时义军陷入绝地，他未能预见这群困兽日后会成为倾覆社稷的滔天巨浪；三是过于相信招抚功效，疏于防范，终致降众反叛，养虎为患。

车厘峡一役，成为明亡史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起义军出峡后，拿下安插官反叛，连

破麟游、永寿等地，势力更盛，终成大明心腹之患。

五

韩补清在拍摄影片《大明总督陈奇瑜》时多次提及，陈奇瑜在陕北任职时，平定乱局，安抚百姓，整顿煤窑、体恤边民，惠及煤矿炭户，百姓感念其德，将其奉为窑神，世代祭祀。此俗相传始于明末清初，是晋陕黄河沿岸特有的地方信仰。

陈奇瑜体恤秦晋桑梓，有史料可证。《保德州乡土志》载：“崇祯五年，(陈奇瑜)历升至延绥巡抚，杀流寇头目百八十人，威著关陕。值本州岁饥，赈以三千金，并代完一年租赋。寻擢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省军务，专办流贼。”《明史》亦云：“五年，擢右金都御史，代张福臻巡抚延绥。时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歼，而余党犹众，岁大凶，民多从贼。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极言郿、延、镇城千余里饥荒盗贼，诏免延安、庆阳田租。”这些史实侧面印证了陈奇瑜对秦晋桑梓的真实态度，在黄河两岸百姓心中，他是为穷苦人留出生路的好官。

而誓死守城的王邵，同样被保德人铭记，《保德州志》载其“请立本州营伍，创筑南阙，踰除增额盐票，州人德之”。一人以坚守捍卫乡梓，一人以宽柔留生路，同为保德人，身处乱世选择各异，却皆出自对乡土的深情眷恋。

六

纵观这段史实：王嘉胤首发其难，点燃明末陕北农民起义的烽火；陈奇瑜误于一纵，错失挽回大明危局的关键之机。然而在黄河两岸穷苦百姓看来，王嘉胤之举是饥民求活，陈奇瑜之策是心怀柔梓。再看王邵以铁腕守住了保德城，陈奇瑜以宽纵放走了陕北义军，两位保德同乡虽做出了不同选择，却都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秦晋边地人物面对乱世的复杂心态。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几百年过去了，陈奇瑜留下的钓鱼台依然矗立在保德故城的黄河绝壁之上，而那数百年间间的忠奸评说，世人诘问、无尽叹息，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散去。或许，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是非评判，而在于透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困境与选择。

一

陈奇瑜，官至五省总督，却因车厘峡一役，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也深刻影响着时局走向，更牵动了大明王朝的国运。《明史》载：“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债师玩寇，贼势日张。”针对车厘峡之役更是直言：“奇瑜有智略，然短于应变，始误封疆。”

其实在明末政局中，陈奇瑜本属能臣之列，其早期政绩与军事才干亦无可否认。崇祯初年，他巡抚河南，“视政所向，随方剿抚”，相继在乌林关、七家沟等地作战，“斩首数千，河南贼尽平”。后擢升兵部右侍郎，总督五省军务，其间“连战连捷，降者数万”，崇祯帝亦下旨令其见机行事：“当剿则剿，当抚则抚。”

史书载，陈奇瑜用兵是先剿后抚，以剿为主、抚为手段，他上报楚中大捷时称“楚中渐有宁宇”，故“帝嘉劳之”，后提拔他为五省总

二

督，希望其能一举荡平流寇。可惜偏偏在车厘峡一役，陈奇瑜一改此前凌厉用兵之势，决意招抚遣散义军，终因轻信伪降，酿成滔天大祸，局面至此不可收拾。

这就不得不提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代表人物——王嘉胤。王嘉胤，明末陕北农民起义最早的领袖之一，崇祯初年在府谷组织饥民近百人揭竿而起，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之后他率众攻取黄甫、清水、木瓜三堡，占领府谷县城；接着由神木渡河入山西，攻占河曲并称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日后纵横天下的人物，或曾隶其麾下，或继其旗号。王嘉胤是府谷人，陈奇瑜是保德人，府谷与保德两地隔黄河相望，自古便有“秦晋之好”的地缘联系。

明末陕北大旱，饥民遍野，暴乱四起。陈奇瑜是本地出身的封疆大吏，他深知明末陕北起义始发于府谷，造反者多为边地饥民与溃兵，同属秦晋桑梓，若一味屠戮既违恻隐之



乾隆帝六次登临五台山

□王晟



五台山

张存良 摄

台时，他特意在菩萨顶为母后举行祈愿仪式，满足太后礼佛心愿。第四次朝台时，他与章嘉国师共同主持法会，彰显了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的宗教信仰并非盲目崇拜，而是融合了儒家思想。他在御制诗中多次提出将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政相结合，即“以圣王之法治天下，而于法王之法，蚤承先训，深契净因，故推演至义，为大众津梁，凡欲万善同归，永资福祐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帝王禅学”。

文化传承：祖制遵循与文治彰显

乾隆六次登临五台山，也是对康熙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康熙皇帝曾五巡五台山，乾隆“不敢超过其祖”的誓言虽广为知，但在朝台次数上却“多出一”，这一微妙变化体现了他既尊重传统又追求超越的复杂心态。《钦定清凉山志》记载，康熙年间曾发帑重修五台山寺庙，乾隆则延续这一传统，多次拨巨款修缮寺院，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

作为清代官修志书，《钦定清凉山志》是乾隆帝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该志由其亲自监修，将康熙序文、御制匾额、碑文、诗文置于篇首，以示尊崇；正文系统梳理了五台山的历史、宗教、文化脉络，宣扬清帝护教佑民之功德。该志的编撰，不仅保存了五台山的历史文化遗产，更通过官方叙事，将五台山纳入清王朝的文化体系，强化了清政权的文化正统性。

乾隆在文治方面成就斐然，六次朝台也成为他彰显文治水平的重要机缘。每次巡幸，他都会创作大量御制诗，内容涵盖山水景物、宗教感悟、政治理念等多个方面，这些诗作被镌刻于碑石之上，很多留存至今。在书法艺术方面，他的御笔匾额遍布五台山各大寺庙，字体雄浑有力，展现了帝王风范。这些匾额不仅是珍贵的艺术品，更是清代帝王文化

的重要载体。

个人情感：孝亲之心与晚年寄托

除政治、宗教、文化因素外，乾隆六次登临五台山，也蕴含着深厚的个人情感，尤其是对母亲的孝心和晚年的精神寄托。前两次朝台，乾隆均是“奉皇太后”或“奉母后”而行，体现了他对母亲的孝顺。乾隆皇帝以孝闻名，其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笃信佛教，朝台礼佛是她的夙愿。

随着年龄增长，乾隆的朝台动机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最后两次朝台时他已是高龄，彼时前往五台山更是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思考和对晚年的寄托。他在第六次朝台诗中写道，“不期再至却常住，既曰言归底幻来”，抒发对五台山的眷恋和对人生的感悟。

五台山这一清凉胜境成为乾隆逃避宫廷琐事、寻求心灵宁静的理想之地，他在诗中多次将五台山视为精神家园，这种个人情感与政治、宗教目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乾隆六次朝台的复杂动机。

结语

乾隆帝六次登临五台山，是中国古代帝王宗教治理与政治治理的典范。六次巡幸，既彰显了怀柔蒙藏、巩固边疆的政治谋略，也成为清代“怀柔远人”边疆政策的生动实践；又承载着乾隆皇帝对文殊菩萨的虔诚崇奉，是其个人宗教信仰的精神皈依；更蕴含着他在文化传承、仁政惠民方面的治世智慧，极大推动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首次西巡，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第六次登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次不辞辛劳的长途跋涉，乾隆皇帝用自己的足迹在五台山书写了一段传奇。这段历史不仅是清代帝王巡幸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见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如乾隆在朝台诗中所写——“大士如如来座莲，金容永镇华峰”，他的六次朝台也如同一座永恒丰碑，矗立在五台山的清凉胜境中，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传承。

(上接第一版)

西口古渡：上演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鹅舞

乙巳年初冬，黄河像一条被岁月磨旧的绸带，蜿蜒在苍茫的北方大地。西口古渡宛若一位远行归来的“走西口”汉子，依偎在母亲河的怀抱里，默默诉说着千年沧桑过往。

作为“走西口”移民的核心通道，西口古渡承载着晋西北百姓远赴内蒙古河套地区谋生打拼的集体历史记忆。从明清至民国初年，无数山西走口外的汉子横渡黄河，经此踏入内蒙古地域。他们常年春去秋归、往返两地，习性就像每年迁徙往复的大雁与白天鹅，故而这群奔走谋生的旅行者也常被称作“雁行客”。然而纵使远赴他乡谋生，大家始终心念故土、不忘乡愁。

清晨时分，我陪同远道而来的友人漫步西口古渡，既体悟到古渡沉淀的岁月沧桑，也真切感受到白天鹅为黄河湿地平添的盎然生机。彼时西口古渡薄雾氤氲，大河、古渡、庙宇、古戏台皆被一层薄霜轻覆，恍若人间仙境。屹立黄河岸畔的护城楼在薄雾中隐约显现，巍峨雄壮的古城墙在一片清冷的氛围里，讲述着往昔金戈铁马的岁月。

经过多年沉淀和近年开发保护，西口古渡已成为黄河湿地公园内独具人文底蕴的特色景区。古渡健身广场与观景区分设上下两处平台，上平台可供群众休闲漫步、健身文娱，下平台便于游客近距离临河观光、赏灯观鸟。

健身广场是舞蹈爱好者的乐园，男女老少齐聚于此，自娱自乐。年轻人扭动腰肢，踏着铿锵的节拍，跳着流行的街舞，尽显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青春风采。中老年群众亦是兴致盎然，自发列队，伴着动感旋律跳起广场舞。他们中有人轻摇折扇，有人裙摆翩跹，有人旋转花伞，各展风采、活力满满。

登临观景台，晋陕蒙三地风光尽收眼底，四时景致各具韵味。立冬时节，候鸟归来，黄河岸畔天鹅翩跹起舞，已然成为西口古渡的一大特色景致，每年都会吸引众多观鸟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及鸟类保护志愿者前来打卡。每逢迁徙季，大批候鸟自西伯利亚远道而来，有的短暂停歇、休憩觅食、补给体能，而后继续向南迁徙；而有的白天鹅则选择在此越冬，栖息至次年三四月再启程北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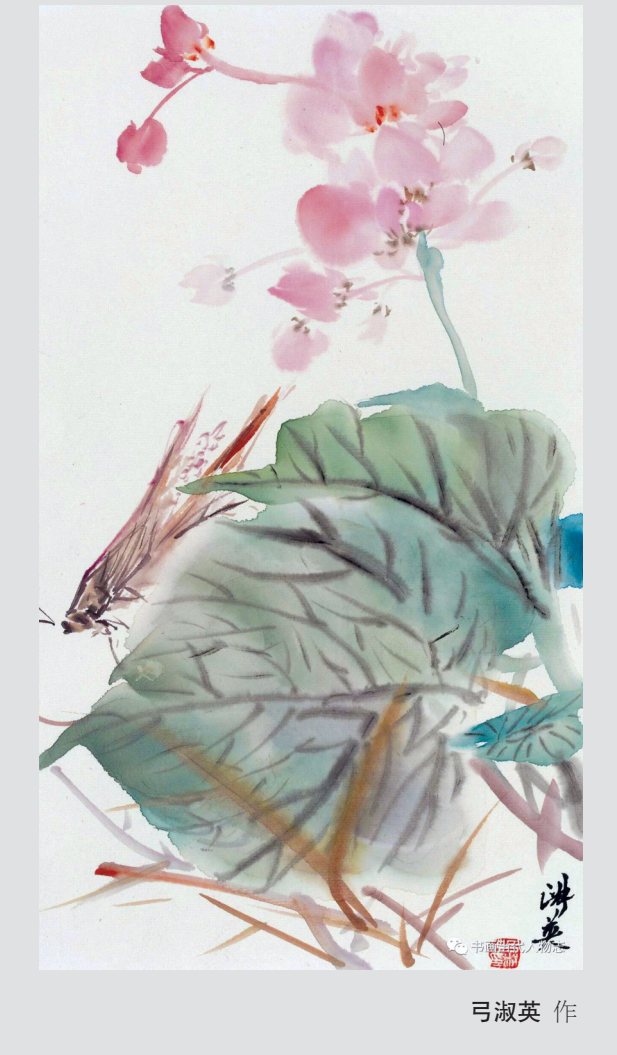
我们驻足古渡河畔，在萧瑟的朔风中静待白天鹅出现。忽然一阵悠扬的鸟鸣划破长空，打破清晨的静谧。抬头望去，十余只白天鹅仿佛听到了某个暗号，开始盘旋着下降，队列始终整齐紧密，时而排成“品”字，时而列成“人”字。它们从内蒙古大漠深处飞来，声声啼鸣在空中相互呼应，像是在确认彼此安全。当它们轻盈滑向水面的刹那，似能感知岸边游人发出的赞叹，赞叹其身姿曼妙，更敬佩其跨越千山万水的勇气。

据一位资深观鸟爱好者介绍，领头的白天鹅是整个群体的主心骨，迁徙途中体力消耗最大。一旦体力不支，便会发出鸣啼信号，族群其他成员随即上前替补领航。白天鹅身上彰显的这种“领头雁”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一个集体倘若人人凝心聚力、团结协作，树立主动担当的大局意识，便没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攻克。

这群宛若仙子的白天鹅入水之后，便立刻欢腾起来，尽显天然灵动之态，让人不禁想起骆宾王那首千古传诵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它们用修长优雅的脖颈轻轻拨动水面，荡起层层涟漪。时而潜入水中，仅露洁白尾羽浮于水面，似在寻觅水中食饵；时而浮出水面，仅露洁白尾羽浮于水面，在暖阳下折射出钻石般的璀璨光芒；时而相互追逐，用修长的脖颈交缠嬉戏，仿若一场趣味角逐；时而彼此依偎，以灵巧的喙轻柔梳理同伴羽翼，好似相互梳妆、温情相伴。

在西口古渡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欢舞的人群与翩跹的白天鹅相映成趣，共同勾勒出一幅浓墨重彩的生态画卷。白天鹅与人类和谐共生，谱写着一曲动人的生命赞歌。白天鹅是大自然的精灵，是黄河湿地的生态主人，更是人们心中恒久的美好景致。我们深知，白天鹅岁岁如约归来，是黄河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珍贵勋章，守护好这份生态荣光，需要大家同心呵护、久久坚守。

画说



刁淑英 作